

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长江三角洲 3 市为例

陈德仙 胡浩¹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 家庭农场是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其经营绩效的影响因素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基于资源依赖理论, 选取长江三角洲 3 市种植类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 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 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具有总体显著和具体差异的影响效果。其中, 设施建设环境和市场营销环境对家庭农场生存绩效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 职业教育环境对家庭农场成长绩效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 职业教育环境对家庭农场创新绩效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研究表明, “完善市场和修建设施来促进生存”以及“加强职业培训来拉动成长和创新”对家庭农场是更为有效率的发展路径。因此, 家庭农场经营环境的优化机制应遵循“效率优化”原则, 即向更具促进效果的经营环境配置更多的政策资源, 进而更为有效率地促进家庭农场的多层次经营绩效。

【关键词】: 家庭农场 经营环境 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227(2021)04-1003-13

农业经营组织变革是一个世纪性难题。列宁、斯大林、恰亚诺夫和舒尔茨等人对此具有截然对立的观点。列宁认为, 商品化必将带来以雇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式大农场和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分化。斯大林则提倡集体式的农业经营组织, 认为其能将小生产转化为高效率的大规模经营并使小农经济现代化。恰亚诺夫^[1]则认为, 小农是在劳动辛苦程度和家庭消费需求满足之间寻求均衡的生产消费合一的单位, 其能通过一体化的合作社克服生产弊病以及避免严重的社会分化。舒尔茨等^[2]从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指出了小农的优势, 但其传统投资收益低下, 进而需要引入更为廉价的现代生产要素包括对农民的人力资本进行投资。我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程度地经历了上述农业经营组织变革实践, 成效与问题同在。那么在未来, 我国农业经营组织变革究竟何去何从? 新时代, 一种正在长江三角洲乡村广泛兴起的新型农业经营组织对此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和变革路径——家庭农场。

当前, 家庭农场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尤为活跃, 主要形成了浙江宁波、上海松江和安徽郎溪 3 种典型的发展模式。家庭农场是一种依赖家庭劳动力从事适度规模经营并具有高度商品化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家庭农场一方面具有适度规模经济、要素高效配置、产业融合的多重收益等诸多比较优势, 又在一定程度上能规避严重的社会分化问题^[3~7]。家庭农场的生成是家庭农户向家庭农场制度逐渐变迁的过程^[8,9], 变迁动力则来源于制度供给(包括扶持政策、地区经验和相关理论等)与制度需求(稀缺要素相对价格变化, 技术进步与家庭分散经营不匹配), 以及需要劳动力市场制度、土地流转制度与社会化服务制度等特定的经营环境^[10,11]。

¹作者简介: 陈德仙(1993~), 男,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E-mail: 1020335685@qq.com

胡浩 E-mail: huhao@njau.edu.cn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AGL020)

其中, 经营环境既影响家庭农场的生成, 也影响其经营绩效。家庭农场运行嵌入在一系列紧密关联的农地制度、财政政策、金融体系、培训制度和社会化服务等经营环境结构中, 其经营绩效好坏必然受到经营环境的影响与限制^[12]。当前, 我国家庭农场与其经营环境并未完全相容, 仍旧面临不成熟的农地交易市场、薄弱乏力的扶持政策、高门槛的金融信贷、缺乏实际效果的职业培训和不健全的社会服务等严峻问题^[13]。亦有实证分析指出, 扶持政策通过企业家才能和社会化服务两条中介路径显著影响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14]; 地权制度、交易制度和管理制度对不同类型的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产生了差异化的影响效果^[15]。除了经营环境, 家庭农场主自身的经营能力也影响着其经营绩效, 包括企业家才能^[14]、管理经验和农业生产技能^[16]、先前经历^[17]和人力资本^[18]等。由此可见, 家庭农场经营绩效主要由经营环境和经营能力决定。

长江三角洲广泛兴起的家庭农场为我国农业经营组织变革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路径, 也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注入了全新的内生性动能。而有效推进该路径和释放该动能既需要舒尔茨所说的向农民投资, 提升人力资本, 也需要恰亚诺夫强调的农民合作社组织, 更需要外部经营环境建设(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也涵盖市场环境和硬件环境等与家庭农场经营紧密相关的外部环境)。当前阶段, 相对于经营能力等自身因素, 外部经营环境状况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则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因此优化经营环境更为重要与迫切。因此, 本研究将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 理论与实证分析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影响的深度关系及其内在影响机制, 最终试图提出一种有效率的家庭农场经营环境优化机制, 进而利于政府更有效率地配置政策资源以及有序提升家庭农场的多层次经营绩效。

1 理论分析

1.1 资源依赖理论及其应用

资源依赖理论是研究经营环境与组织关系的重要理论。资源依赖理论萌芽于 20 世纪中期, 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逐渐发展成熟。菲佛和萨兰基克是资源依赖理论的集大成者, 其代表著作是《组织的外部控制: 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菲佛等^[19]从 3 个方面分析了经营环境与组织的关系, 分别是经营环境对组织的影响、组织应对经营环境约束和资源依赖对组织内部权力分配的影响。其中, 第一块研究内容对本研究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主要提出了以下 4 个重要假设: (1) 实现生存是组织最为重要的事情, 其关键在于获取和维持资源的能力; (2) 组织往往不具有生存所需的一切资源, 而这些稀缺资源主要分散在外部环境中; (3) 组织必须与其外部经营环境(包括其中的组织)进行互动以获取生存所需的财政、物质和信息等稀缺资源, 这将产生组织资源依赖和外部控制(资源控制者对组织的权力); (4) 组织的生存状况取决于组织关系的构建和控制能力, 组织为了应对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必须与政府、顾客、供应商和竞争者等处理好资源交换关系。

菲佛和萨兰基克构建的资源依赖理论代表了组织研究的“开放系统模式”, 即植根于组织外部的经营环境来认识组织结构和组织行动。其中, 组织对经营环境的能动性作用是资源依赖理论最重要的理论贡献。资源依赖理论更强调组织可以主动通过适应或规避外部需求、采取一体化的合并模式和展开政治性活动等多元化的战略行动, 进而改变和管理组织的外部经营环境。这也使组织与经营环境关系分析成为一种双向关系, 极大地区别于既有组织理论对此的单向认识。随着资源依赖理论的成熟, 其被广泛地应用于分析各种组织与经营环境关系。当然, 资源依赖理论也同样适用于家庭农场组织与其经营环境的关系分析, 且该理论尚未应用于家庭农场研究领域。因此,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

1.2 经营环境与经营绩效的理论关系

除了以上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展开的理论性分析, 还有一些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为本研究的理论关系提供了实证依据。一项关于回村农民工经营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显示, 经营环境对回村农民工的绩效表现具有重要影响, 社会资本和服务环境直接影响回村农户的经营绩效表现, 政策环境对经营绩效的直接影响效果不显著, 但能通过服务环境这一中介因素产生间接的影响^[20]。还有一项关于经营环境对乡村小型创业组织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指出, 设施建设、金融信贷、政策扶持、市场环境、服务环境和区域文化等经营环境维度对乡村小型创业组织的经营绩效具有显著的影响效果, 但具体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21]。认知要

素(知识结构环境)对家庭农场绩效表现有直接显著的影响效果, 规制性要素(政策支持环境)和规范性要素(创业文化环境)在认知性要素与家庭农场经营绩效之间扮演正向调节的角色^[22]。制度环境对家庭农场具有多维度的影响, 其对家庭农场的生成、适度规模及经营绩效等都具有影响作用^[23]。相关研究成果初步表明, 经营环境对农民经营组织的绩效表现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即良好的经营环境有利于其经营绩效的释放与发挥。当然, 除了经营环境这一关键性外部因素, 家庭农场内部的经营类型、经营能力、人资资本和社会经历等相关因素也将对其经营绩效产生一定的作用, 不同特征不同类型的家庭农场将可能产生不同的经营成效。而本研究将主要研究不同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不同经营绩效的深度影响关系及其内在机理。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样本来源与样本选取

家庭农场主的研究样本分别来源于长江三角洲杭州、宁波和金华 3 个地区中相对分散的乡村。长江三角洲是全国范围内家庭农场最为活跃、成效最好的地域, 而上述调查地区又是长三角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家庭农场发展地区。这 3 个地区的家庭农场起步早, 不同程度地经历了起步阶段、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 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发展成果。其中, 浙江宁波早在 2003 年率先形成了我国最早的家庭农场雏形, 目前则成为了我国家庭农场的五大样本之一。因此, 选择这 3 个地区的家庭农场研究样本来分析经营环境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在 2018 年 2~3 月和 7~8 月两个阶段, 针对上述 3 个地区的 150 个家庭农场展开问卷调查, 回收有效问卷 142 份, 包括 37 个杭州市家庭农场、41 个宁波市家庭农场和 64 个金华市家庭农场, 有效回收率为 94.67%。样本特征如下: 87.3%的家庭农场主为男性; 75.4%的家庭农场主集中在 45~59 岁; 16.2%的家庭农场主具有大专或本科学历; 52.1%的人在创办家庭农场之前的经历是在当地务农; 家庭农场的自有家庭劳动力平均为 2.62 人, 常年雇工平均为 3.12 人, 季节性雇工平均为 10.51 人; 33.8%的家庭农场的土地面积不超过 1.3hm², 平均经营规模为 9.3hm²; 家庭农场平均创办时间为 6.02 年; 51.4%的家庭农场经营类型为蔬菜瓜果; 59.9%的家庭农场进行工商注册登记; 70.4%的家庭农场是非示范性农场; 41.5%的家庭农场年收入在 20 万以下(表 1)。

表 1 样本特征

项目	具体比例
性别	男性: 87.3%;女性: 12.7%
年龄	16~29 岁: 2.1%;30~44 岁: 19.7%;45~59 岁: 75.4%;60 岁及以上: 2.8%
文化	小学及以下: 13.4%;初中: 31.0%;中专或高中: 39.4%;大专或本科: 16.2%
经历	当地务农: 52.1%;外出务工: 21.1%;外出经商: 13.4%;高校毕业: 2.8%;军人退伍: 3.5%;其他: 7.0%
土地面积	1.3hm ² 及以下: 33.8%;1.4~6.7hm ² :19.0%;6.8~13.3hm ² :21.8%;13.4~33.3hm ² :21.9%;33.3hm ² 以上: 3.5%
经营类型	粮食类: 28.9%;蔬菜瓜果: 51.4%;花卉园艺: 2.8%;种养结合: 4.2%;其它: 12.6%
工商注册	未注册: 40.1%;注册: 59.9%
示范级别	非示范家庭农场: 70.4%;县级示范: 11.3%;市级示范: 9.9%;省级示范: 8.5%
经营年收入	20 万以下: 41.5%;20~59 万: 26.8%;60~99 万: 22.5%;100 万以上: 9.2%

调查样本中的家庭农场主几乎为男性，普遍为中年人，文化程度不高，多数家庭农场主是由小农户经营者转换而来的；调查样本中的家庭农场的劳动力主要来源于家庭自有劳动力和部分雇工，农忙时节雇佣较多的劳动力，家庭农场的平均经营规模超过百亩，基本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经营类型主要为经济型作物，多数家庭农场不具有示范性，经营性收入由低到高的占比逐渐减少。总体来讲，样本中家庭农场主的经营素养相对一般且各项结构较为单一化，还存在非家庭经营和管理不规范等实践偏离特征。因此，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及其健康持续发展将更加依赖于其外部经营环境。

2.2 变量与测量

在资源依赖理论下，家庭农场的经营环境主要是一种资源交换关系状况，包括外部的资源支持强度、资源获取效率、资源渠道丰富性、资源获取方式等方面。因此，家庭农场各维度的经营环境测量指标体系将据此提出，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家庭农场经营环境涵盖了政策扶持环境、金融信贷环境、市场营销环境、职业教育环境、设施建设环境和文化营造环境^[23]。政策扶持环境常用的指标有政策多样性、政策补贴强度、政策连续性、行政人员办事效率和行政人员服务态度 5 个指标^[21, 24]。金融信贷环境则能通过融资贷款渠道丰富性、融资贷款方式多样性、贷款程序手续简便性和融资贷款利息 4 个指标来衡量^[25]。市场营销环境主要包括农产品城市直销情况、农产品展销举办效果、农产品电商销售情况和市场信息服务水平 4 个指标^[21]。职业教育环境包括培训多样性、培训实用性和培训形式灵活性 3 个指标^[26]。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包括土地设施优良性、农业设施优良性、电商设施优良性和物流设施优良性 4 个指标^[27]。家人支持力度、创业氛围浓厚性、创业组织相互扶持和赞赏创业成功者这 4 个指标能较好地度量文化营造环境^[23, 28]。

家庭农场作为一个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业企业，其不再会像小农户那样仅关注家庭消费和基本生存问题，而是会像一个企业一样将其产品与服务面向市场，并采取一系列的获利、成长和创新等市场经济行为。不同的家庭农场在这些方面的行为和活动具有不同的强弱程度和实践表现，进而产生不同的行为绩效与获益程度。因此，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包括生存绩效、成长绩效和创新绩效^[23]。年销售额、市场份额和投入回报速度 3 个指标能较好地反映家庭农场在市场中的获利状况^[29, 30]。家庭农场的成长绩效则是指家庭农场在面对市场时组织的成长表现，主要包括家庭农场主的经营管理能力、农产品顾客满意度和整体市场竞争力 3 个指标^[21]。创新绩效测量指标分别是新农产品的生产数量、新农产品的引进力度和新组织管理制度的建立 3 个指标^[31]。

经过专家评估、实地试用和修改完善等程序，进而形成《家庭农场的经营环境与经营绩效量表》。量表采用 Likert5 级测评方式来测量相关指标，即家庭农场主根据认同程度对相关指标进行 1~5 打分(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和非常同意)。采用该测量方式的原因有三：一是本文定义的家庭农场经营环境是其自身认识和理解的结果；二是主观认识结果能较好地反映抽象经营环境的好坏状况；三是此种测量方式更具可操作性并利于数据收集。指标体系包括政策扶持环境(Policy Support)、金融信贷环境(Financial Credit)、市场营销环境(Marketing Management)、职业教育环境(Vocational Education)、设施建设环境(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和文化营造环境(Cultural Construction)6 部分(表 2)。

表 2 家庭农场的经营环境与经营绩效量表

变量	编号	测量指标	参考来源
政策扶持环境 (PS)	PS1	当地政府实施了诸多家庭农场扶持政策	[21, 24]
	PS2	当地政府针对家庭农场有较高的政策补贴力度	
	PS3	当地政府实施的家庭农场政策连续性较强	
	PS4	当地政府行政人员的办事效率较高	
	PS5	当地政府行政人员的服务态度较好	

金融 信贷 环境 (FC)	FC1	当地融资贷款的渠道较为丰富	[25]
	FC2	当地融资贷款的方式较为多样	
	FC3	当地融资贷款的程序手续较为简单方便	
	FC4	当地融资贷款的利息较低	
市场 营销 环境 (MM)	MM1	当地农产品在城市的直销情况较好	[21]
	MM2	当地农产品的展销举办效果较好	
	MM3	当地农产品的电商销售情况较好	
	MM4	当地农产品的市场信息服务水平较高	
职业 教育 环境 (VE)	VE1	职业培训的内容较为丰富	[26]
	VE2	职业培训内容的实用性较强	
	VE3	职业培训的形式较为灵活	
设施 建设 环境 (IC)	IC1	当地的土地和农田设施建设优良	[27]
	IC2	当地的农业设施建设优良	
	IC3	当地的电商平台设施建设优良	
	IC4	当地的物流设施建设优良	
文化 营造 环境 (CC)	CC1	当地创业普遍得到家人的大力支持	[23, 28]
	CC2	当地积极创业的文化氛围较为浓厚	
	CC3	当地的创业组织普遍会相互帮助和扶持	
	CC4	当地人普遍赞赏有能力的成功创业者	
生存 绩效 (SP)	SP1	您的家庭农场的年销售额较高	[29, 30]
	SP2	您的家庭农场的市场份额较大	
	SP3	您的家庭农场的投入回报速度较快	
成长 绩效 (GP)	GP1	家庭农场主的经营管理能力提升较快	[21]
	GP2	家庭农场的农产品质量顾客满意度提升较快	
	GP3	家庭农场的整体市场竞争力提升较快	
创新 绩效 (IP)	IP1	家庭农场的新农产品的生产数量较大	[31]
	IP2	家庭农场的新农业技术引进力度较大	
	IP3	家庭农场的新组织管理制度建设得较为健全	

3 结果与分析

3.1 信度与效度检验

首先,进行初步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分析。依据 Cronbach' s α 、项已删除的 Cronbach' s α 、CITC 和因子载荷等相关参数,一共剔除了 3 个测量指标,分别是“当地政府实施的家庭农场政策连续性较强”(PS3)、“当地融资贷款的利息较低(FC4)”和“当地人普遍赞赏有能力的成功创业者(CC4)”。经过修正后的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表 3)具体如下:

表 3 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编号	信度分析与探索性因子分析				验证性因子分析				
		Cronbach' s α	CITC	因子载荷	累计方差贡献率	因子载荷	临界比率	P 值	组合信度	AVE
政策扶持环境(PS)	PS1	0.888	0.715	0.814	14.867%	0.770	16.793	***	0.894	0.678
	PS2		0.739	0.823		0.788	17.571	***		
	PS4		0.735	0.788		0.790	17.605	***		
	PS5		0.848	0.840		0.935				
金融信贷环境(FC)	FC1	0.825	0.665	0.766	29.420%	0.783	12.350	***	0.826	0.612
	FC2		0.710	0.847		0.794	12.508	***		
	FC3		0.672	0.786		0.770				
市场营销环境(MM)	MM1	0.873	0.713	0.781	43.483%	0.784	14.529	***	0.875	0.636
	MM2		0.760	0.826		0.829	15.558	***		
	MM3		0.688	0.808		0.743	13.546	***		
	MM4		0.756	0.802		0.831				
职业教育环境(VE)	VE1	0.811	0.623	0.760	50.029%	0.727	11.402	***	0.813	0.593
	VE2		0.668	0.839		0.768	11.830	***		
	VE3		0.695	0.835		0.812				
设施建设环境(IC)	IC1	0.902	0.743	0.834	64.600%	0.743	13.620	***	0.896	0.685
	IC2		0.820	0.872		0.827	15.853	***		
	IC3		0.830	0.871		0.912	17.490	***		
	IC4		0.736	0.783		0.820				
文化营造环境(CC)	CC1	0.836	0.725	0.832	75.499%	0.819	14.015	***	0.842	0.640

	CC2		0.670	0.785		0.753	13.000	***		
	CC3		0.706	0.778		0.825				
生存绩效 (SP)	SP1	0.866	0.728	0.826	26.659%	0.802			0.869	0.689
	SP2		0.790	0.854		0.888	15.617	***		
	SP3		0.722	0.824		0.797	14.286	***		
成长绩效 (GP)	GP1	0.772	0.562	0.764	52.806%	0.667			0.779	0.542
	GP2		0.674	0.821		0.822	10.290	***		
	GP3		0.587	0.767		0.711	9.674	***		
创新绩效 (IP)	IP1	0.874	0.789	0.853	76.132%	0.893			0.875	0.701
	IP2		0.759	0.877		0.819	16.249	***		
	IP3		0.733	0.826		0.796	15.688	***		

(1) 信度检验。

主要采用克隆巴哈系数 (Cronbach' s α) 和校正的项总计相关性 (CITC) 来反映各相关变量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经过修正与完善后的量表的信度检验结果具体如下：政策扶持环境、金融信贷环境、市场营销环境、职业教育环境、设施建设环境、文化营造环境、生存绩效、成长绩效和创新绩效 9 个变量的 Cronbach' s α 值分别为 0.888、0.825、0.873、0.811、0.902、0.836、0.866、0.772、0.874，信度系数位于 0.772~0.902 之间；此外，相关衡量指标的 CITC 值均大于 0.5，具体在 0.760~0.877 之间。可以看出，修订后的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可靠性，调查数据相较可靠。

(2) 效度检验。

运用 SPSS 软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经营环境和经营绩效的 KMO 值分别为 0.879 和 0.849，Bartlett 的球形度测试的 Sig 值都为 0.000，达到显著性水平，因此两者都适宜做因子分析。经营环境方面：根据矩阵特征值大于 1 提取了 6 个因子，6 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 75.499%，因此提取的公因子反映了原有指标的大部分信息，进而非常好地解释了经营环境量表；采用正交旋转法并根据指标在相应公因子上的载荷值 (以大于 0.5 为标准)，将 21 个经营环境指标归纳为 6 类公因子，并分别命名为政策扶持环境、金融信贷环境、市场营销环境、职业教育环境、设施建设环境和文化营造环境 6 个经营环境因子。利用同样的方法将经营绩效 9 个指标归纳为生存绩效、成长绩效和创新绩效 3 类公因子。再运用 AMOS 软件并使用极大似然法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使用结构效度和区分效度来反映变量的内在相关性以及变量之间的差异存在性。经营环境的结构效度方面：21 个指标同样能归纳为 6 分公因子，各指标在其公因子上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 0.5，临界比率均大于 1.96，均在 0.001 水平上显著；各因子的组合信度分别为 0.894、0.826、0.875、0.813、0.896 和 0.842 (组合信度 > 0.7)，表明组合信度良好；各因子的平均方差抽取量 (AVE) 分别为 0.678、0.612、0.636、0.593、0.685 和 0.640 (AVE > 0.5)，表明收敛有效性良好。经营环境的区分效度方面，变量的最小平均方差抽取量 AVE 正平方根为 0.770，大于最大的相关系数 0.525，表明经营环境 6 个因子变量两两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同样，经营绩效也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和区分效度。

3.2 影响模型的适配度检验

结构方程模型的适配度配检验需要考虑绝对适配度、增值适配度、简约适配度等方面，主要包括 CMIN/DF(卡方自由度比值)、RMSEA(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R(残差均方和平方根)、GFI(适配度指数)、CFI(比较适配度指数)、IFI(增值适配度指数)和 PNFI(简约调整后的规范适配指数)等常用检验指标。模型的适配度越好，表明理论模型与实际数据之间的契合度越高，构建的影响模型越有说服力。结构方程模型的适配度测试结果如下：CMIN/DF 值为 1.268, RMSEA 值为 0.031, RMR 值为 0.026, GFI 值为 0.905, CFI 值为 0.980, IFI 值为 0.980, PNFI 值为 0.769(表 4)。与理想标准进行比较发现：CMIN/DF 大于 1 且小于 3, RMSEA 小于 0.080, RMR 小于 0.080, GFI 大于 0.900, CFI 大于 0.900, IFI 大于 0.900, PNFI 大于 0.500。从模型的适配度检验结果来看，结构方程模型整体适配度的 7 个检验指数均达到理想标准，这意味着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影响模型与实际数据之间存在较高的吻合度，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影响模型的检验结果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表 4 结构方程模型的适配度检验指标

适配度检验指标	理想标准	一般标准	模型结果	检验结论
CMIN/DF	1~3	<10	1.268	符合
RMSEA	<0.080	<0.100	0.031	符合
RMR	<0.080	<0.100	0.026	符合
GFI	>0.900	>0.800	0.905	符合
CFI	>0.900	>0.800	0.980	符合
IFI	>0.900	>0.800	0.980	符合
PNFI	>0.500	>0.400	0.769	符合

3.3 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有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容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含有测量误差等优点。因此，本研究运用 AMOS21.0 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主要根据标准化路径系数和显著性 P 值等检验指标验证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或模型的假设是否得到支持。对模型进行结构方程分析，并对误差项进行优化修正后的模型拟合结果如下所示(表 5)。

(1) 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生存绩效的影响结果。

政策扶持环境(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76, P<0.01)、金融信贷环境(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34, P<0.05)、市场营销环境(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213, P<0.001)、职业教育环境(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46, P<0.05)、设施建设环境(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258, P<0.001)和文化营造环境(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97, P<0.01)对家庭农场生存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 5)。这表明家庭农场面临越为有利的政策扶持、金融信贷、市场营销、设施建设、职业教育和文化营造环境时，越有利于其在市场中实现获利并转化和释放出良好的生存绩效。其中，设施建设环境和市场营销环境对家庭农场生存绩效具有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效果，这意味着设施建设环境和市场营销环境相比于其它经营环境维度对家庭农场的市场获利和市场生存具有更明显的影响作用。这可能因为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能有效地帮助家庭农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产品配送效率，引来更多的消费者和扩展市场空间等，进而在其市场获利和生存方面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而良好的市场营销环境则能使家庭农场具备城市直销、当地展销和网络营销等更加多元的营销渠道并掌握更充分的市场信息，进而对其市场获利发挥更显著的作用。

表 5 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结果

路径关系	路径系数	标准化路径系数	标准误差	组合信度 C. R.	显著性 P	检验结果
SP←PS	0.139	0.176	0.048	2.909	0.004	支持
SP←FC	0.132	0.134	0.064	2.058	0.040	支持
SP←MM	0.192	0.213	0.056	3.427	***	支持
SP←VE	0.127	0.146	0.051	2.489	0.013	支持
SP←IC	0.207	0.258	0.044	4.647	***	支持
SP←CC	0.175	0.197	0.059	2.987	0.003	支持
GP←PS	0.143	0.186	0.057	2.497	0.013	支持
GP←FC	0.171	0.177	0.078	2.199	0.028	支持
GP←MM	0.166	0.187	0.068	2.439	0.015	支持
GP←VE	0.224	0.263	0.063	3.543	***	支持
GP←IC	0.138	0.177	0.052	2.642	0.008	支持
GP←CC	0.004	0.005	0.069	0.061	0.951	不支持
IP←PS	0.168	0.166	0.072	2.343	0.019	支持
IP←FC	0.161	0.127	0.097	1.664	0.096	不支持
IP←MM	0.232	0.199	0.084	2.757	0.006	支持
IP←VE	0.375	0.336	0.08	4.72	***	支持
IP←IC	0.134	0.130	0.065	2.048	0.041	支持
IP←CC	-0.036	-0.031	0.088	-0.406	0.685	不支持

(2) 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成长绩效的影响结果。

政策扶持环境(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86, $P<0.05$)、金融信贷环境(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77, $P<0.05$)、市场营销环境(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87, $P<0.05$)、职业教育环境(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263, $P<0.001$)和设施建设环境(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77, $P<0.01$)5 个经营环境维度对家庭农场成长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文化营造环境(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005, $P>0.05$)对家庭农场的生存绩效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 5)。其中,职业教育环境对家庭农场成长绩效具有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效果。这可能因为良好的职业教育环境使家庭农场主接受的职业培训更加多元和更加实用,使家庭农场主通过职业培训机制有效获取生产经营、农业技术、风险管理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相关技能和知识资源,而这对于家庭农场组织的经营管理能力、农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等方面具有更加显著的提升作用。另外,文化营造环境对家庭农场成长绩效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此可能的解释是,良好的文化营造环境或许能促进家庭农场对文化资源的获取和吸收并产生更积极的创业主动性,但这对于家庭农场组织

的全面成长并不能产生明显的提升作用。

(3) 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

政策扶持环境(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66, $P<0.05$)、市场营销环境(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99, $P<0.01$)、职业教育环境(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336, $P<0.001$)和设施建设环境(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30, $P<0.05$)4 个经营环境维度对家庭农场创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金融信贷环境(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34, $P>0.05$)和文化营造环境(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031, $P>0.05$)对家庭农场创新绩效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果。良好的金融信贷环境和文化营造环境能促进资金资源和创业文化资源更好地流向家庭农场,但无法有效激励家庭农场主主动进行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等,因而这两类创业环境并不能显著影响家庭农场的创新绩效。而职业教育环境对家庭农场创业绩效具有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效果,这意味着家庭农场主通过良好的职业培训后将具有更强的组织创新建设内动力,并通过获取的知识和技能资源显著提升自身的组织创新建设效果。

上述分析认为,当前阶段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具有更好的解释效果,因此主要侧重于外部各维度的经营环境与家庭农场内部各层次的经营绩效之间的深度影响关系,进而忽略了家庭农场内部经营能力等因素对其经营绩效的影响作用,或者说将这些因素假定为固定不变水平。实际上,除了外部各维度的经营环境,家庭农场内部各相关因素也将对其经营绩效产生一定的影响。当家庭农场主及其家庭成员的经营能力迅速成长时,其可以在外部经营环境一定时,甚至可以通过自身卓越的经营能力改善所处的经营环境和资源交换关系,将获取更多资源以及将所获资源有效率地配置于各项生产经营途径中,进而使得资源有效率地得到利用并转化出良好的生存、成长和创新绩效。相反,当家庭农场主经营能力一般时,就无法争取更多的经营资源,也难以合理地利用和配置既定资源,进而无法有效提升其经营绩效。正如同相关研究指出企业家才能^[14]、管理经验和农业生产技能^[16]、先前经历^[17]和人力资本^[18]等家庭农场主经营能力相关因素对其经营绩效具有显著影响作用。此外,不同类型的家庭农场也存在着差异化的影响效果,例如经营环境可能对粮食类家庭农场和蔬菜瓜果类家庭农场具有不同的影响作用和效果。相关研究^[16]指出,农业基础设施支持力度、农业技术培训和农业补贴等因素对粮食类家庭农场的绩效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农产品销售关系和贷款成本对蔬菜瓜果类家庭农场的绩效具有显著影响作用。这种差异化影响效果的原因可能是不同种植产业的特性造成的。粮食类家庭农场具有低产值和低附加值特性,这一方面使其需要相应的土地规模化经营,进而更加依赖各项设施设备和机械服务等;另一方面,也使其更需要相应的补贴支持。蔬菜瓜果类家庭农场则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使其需要雇佣一定的外部劳动力;需要建立稳定良好的市场销售渠道,进而更好更快地销售其农产品;其高成本投入则使其需要更多的借贷资金。由此可见,不同维度的经营环境对不同类型的家庭农场将产生不同的影响作用和效果,粮食类家庭农场将可能更加依赖于当地的基础设施、政策扶持和职业培训环境等,而蔬菜瓜果类家庭农场将可能更加依赖于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市场销售和金融信贷环境等。

3.4 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剖析

首先,家庭农场基于“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函数”需要充分的资源。家庭农场在市场交易、市场需求和市场竞争中追求更好的组织获利表现、组织成长表现和组织创新发展表现,进而实现收益最大化的根本目标,这必然需要家庭农场具备充分的经营资源。实践过程中,家庭农场组织获取并掌握的资源越丰富,其绩效也就越好。只有家庭农场具备了充分的资源,才能更有力度地将资源配置于土地流转、机械购置、技能学习、设施建设、产品引入、品牌创建和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而转化和释放出良好的生存绩效、成长绩效和创新绩效。

其次,家庭农场组织自身普遍存在较为严重的资源困境。我国家庭农场总体上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即使家庭农场在创办之前乃至创办过程中已经通过各类方式积累了一定的资源,但大多数家庭农场仍旧不具有生存、成长和创新所需的各类创业资源,这将极大地影响家庭农场绩效的转化与释放。一项关于家庭农场需求的调查研究显示,35.0%的家庭农场第一需要的是政策资金补贴,30.0%的家庭农场第二需要的是科学技术培训,21.1%的家庭农场第三需要的是金融信贷,26.9%的家庭农场第四需要的是农产品销售^[32]。这组数据不仅反映了家庭农场的资源需求结构,也反映了家庭农场自身的资源困境。即便像浙江杭州、

宁波和金华这些家庭农场发展较好的地区，也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诸多家庭农场自身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各样的资源困境。由此可见，家庭农场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各类资源困境，这将进一步限制其绩效的发挥和释放。

再次，家庭农场只能通过与环境互动获取发展所需的各类资源。虽然家庭农场自身普遍存在各种各样的资源困境，但其往往可以通过与外部环境进行互动进而获取发展所需资源，通过积极互动并建立和维持一种良好的资源交换关系。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家庭农场力图向政府部门申请扶持政策，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参加科研院所和高校组织的技能培训，与社会化服务组织建立服务供需关系，进而获取发展所需的策资源、资金资源、市场资源、技能资源、设施资源和创业文化资源等稀缺资源。家庭农场组织通过与外部创业环境互动来获取各类资源，并进一步通过组织内部的资源利用和转化进而产生出绩效。当然，家庭农场与环境的互动和资源交换关系是双向的，因此相关组织能否主动为家庭农场营造良性的环境也将决定资源的流向和配置效果。

此外，家庭农场亦可以通过组织化行动改善经营环境。资源依赖理论显示，组织为了降低资源依赖和外部控制，组织将主动实施多元化的战略行动，例如采取横向或纵向一体化的合并模式将外部控制内部化，通过合资企业、联合董事会和行业协会建立组织间行动的集体构架。同样，家庭农场组织为了克服自身普遍存在的资源困境，其将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并采取各种各样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的组织化模式建立组织间的集体构架。这就可以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来解释为什么近年来调查地区中出现了很多以家庭农场为基本单位构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协会、家庭农场联盟等。家庭农场通过积极采取组织化行动试图进一步作用于其外部环境，进而刺激和激励外部环境朝着更利于家庭农场发展的方向变迁，这将有助于各类资源更有效率地流向家庭农场组织，并提升家庭农场对各类资源的获取效果，最终转化出良好的绩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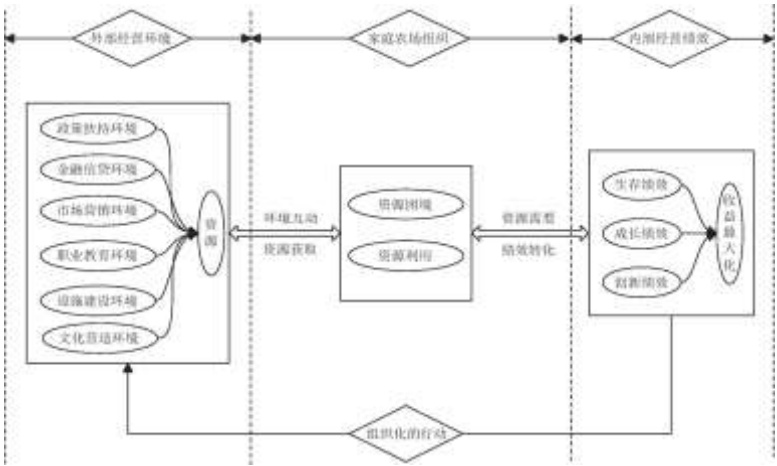


图 1 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机理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结论

(1) 六维度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三层次经营绩效基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扶持环境、金融信贷环境、市场营销环境、职业教育环境、设施建设环境和文化营造环境 6 个维度对家庭农场生存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扶持环境、金融信贷环境、市场营销环境、职业教育环境和设施建设环境 5 个维度对家庭农场成长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扶持环境、市场营销环境、职业教育环境和设施建设环境 4 个维度对家庭农场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越是全面有利的外部经营环境越利于释放家庭农场内部的多层次经营绩效。

(2)不同维度的经营环境对不同层次的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具有差异化的影响效果。其中，设施建设环境和市场营销环境对家庭农场生存绩效具有更加显著的正向影响效果，职业教育环境对家庭农场成长绩效具有更加显著的正向影响效果，职业教育环境对家庭农场创新绩效具有更加显著的正向影响效果。因此，“完善市场和修建设施来促进生存”以及“加强职业培训来拉动成长和创新”，对于家庭农场是更为有效率的发展路径。

(3)经营环境通过资源对家庭农场内部经营绩效产生深度影响。家庭农场生存、成长和创新绩效的提升本质上是家庭农场组织内部对外部经营环境中各种资源的需要、获取、利用和转化的过程与结果。因此，外部各相关主体主动为家庭农场优化经营环境以及家庭农场自身通过组织化的行动来倒逼经营环境的改善，将使得家庭农场与外部建立一种更为良性的资源交换关系，进而有利于改善家庭农场的资源获取效率和效果，最终转化出更好的经营绩效。

本研究在理论模型构建、测量量表设计和研究方法使用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贡献和发展之处。第一，既有研究多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等理论建立理论化的解释模型，本研究首次借鉴资源依赖理论重构了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模型，更为系统和宽泛地划分了家庭农场的经营环境和经营绩效，理论与实证分析了多维度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多层次经营绩效的深度影响关系及其内在影响机理。第二，设计了一套科学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家庭农场经营环境和经营绩效测量量表，通过规范的程序检验了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既有研究在家庭农场经营环境量表上的发展空缺与不足。第三，相比于传统的研究方法，本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法验证理论模型，结构方程模型能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多个自变量对多个因变量的路径关系，通过路径系数值排序可以归纳出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更具促进效果的经营环境，进而在经营环境优化政策制定和实施中有所偏向和侧重。

4.2 政策启示

基于政府的政策视角，家庭农场经营环境的调节和改善就成为政策资源向不同用途和维度经营环境的配置过程和分配结果，政策资源配置状况将会影响家庭农场整体经营环境好坏状态并进一步对其经营绩效产生作用。地区政府在此过程中往往面临政策资源提升但有限的约束条件，但其政策资源配置至少具有效率优化的空间，其基本原则是将更多的政策资源配置向更具促进效果的经营环境。当家庭农场面临不同的经营绩效困境时，地区政府部门应专门为家庭农场采取针对性的经营环境优化措施。

(1)当家庭农场面临生存绩效困境时，应将更多的政策资源用于优化市场营销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通过完善家庭农场的市场和修建设施来促进其市场生存和市场获利。市场营销方面，需要大力支持家庭农场扩展市场直销、社区直销、中间组织收购、农产品展销和电商销售等市场营销渠道，使其农产品面向更广泛的市场空间并获得更多的市场收益；另外，需要加大推进市场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使家庭农场主能更充分和更及时地掌握市场信息，进而更有效地进行生产经营决策。与此同时，还需要加大农田、水利、加工、销售和运输等方面的农业产业化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家庭农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产品配送效率，引来更多的消费者以及扩展市场空间等。

(2)当家庭农场面临成长绩效和创新绩效困境时，应将更多的政策资源用于优化职业教育环境，通过加强家庭农场的职业培训来拉动其成长和创新。相关政府部门应积极探索并推动建设一套正式有效的职业教育培训机制和农业技术知识推广传播机制。灵活采用当面培训、实践指导或网络授课等培训方式，加大对家庭农场主经营管理、产品质量管理、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等方面的专项培训，实现家庭农场主各项经营能力和家庭农场组织的全面成长。与此同时，还应重视职业教育对家庭农场创新的显著作用。运用职业培训途径向家庭农场主灌输创新知识和创新意识等，培育其自身内在的创新发展动力；制定与实施相应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产业创新等创新支持发展政策，引导与激励家庭农场创新发展。

(3)家庭农场的横纵一体化等组织化行动不仅能“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连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提升市场竞争力”，也能推动改善家庭农场与外部的资源交换关系状况。因此，除了直接将政策资源用于家庭农场经营环境优化外，也可以制定与出台相应的家庭农场横纵一体化建设政策，鼓励家庭农场横向联合和纵向联合，通过家庭农场组织化模式倒逼外部经

营环境朝着更有利于其自身发展方向变迁,进而改善家庭农场与外部的资源交换关系,实现各类经营资源更有效率地流向家庭农场,最终有利于提升家庭农场的多层次经营绩效。

参考文献:

- [1]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M].萧正洪,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12.
- [2]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46,83,150.
- [3]郭熙保,冯玲玲.家庭农场规模的决定因素分析:理论与实证[J].中国农村经济,2015(5):82-95.
- [4]郭熙保.“三化”同步与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农业规模化经营[J].社会科学研究,2013(3):14-19.
- [5]郭熙保,冯玲玲.家庭农场:当今农业发展最有效的组织形式——基于东南亚国家土地制度变迁的视角[J].江汉论坛,2015(6):5-11.
- [6]黄宗智.“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J].开放时代,2014(2):176-194.
- [7]陈义媛.资本主义式家庭农场的兴起与农业经营主体分化的再思考——以水稻生产为例[J].开放时代,2013(4):137-156.
- [8]伍开群.家庭农场的理论分析[J].经济纵横,2013(6):65-69.
- [9]伍开群.制度变迁:从家庭承包到家庭农场[J].当代经济研究,2014(1):37-44.
- [10]高强,刘同山,孔祥智.家庭农场的制度解析:特征、发生机制与效应[J].经济学家,2013(6):48-56.
- [11]何劲,熊学萍.家庭农场绩效评价:制度安排抑或环境相容[J].改革,2014(8):100-107.
- [12]杜志雄,肖卫东.家庭农场发展的实际状态与政策支持:观照国际经验[J].改革,2014(6):39-51.
- [13]何劲,Emmanuel K.Yiridoe,祁春节.加拿大家庭农场制度环境建设经验及启示[J].经济纵横,2017(5):118-122.
- [14]曾福生,李星星.扶持政策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基于SEM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6,37(12):15-22,110.
- [15]陈军民.制度结构与家庭农场的运行效率及效益[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6(5):1-14.
- [16]张德元,李静,苏帅.家庭农场经营者个人特征和管理经验对农场绩效的影响[J].经济纵横,2016,365(4):77-81.
- [17]兰勇,谢先雄,易朝辉,等.农场主经历对农场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5(4):92-97.

-
- [18]汪兴东, 刘文兴. 家庭农场运作绩效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J]. 商业研究, 2013, 55(10):160-164, 190.
- [19]杰弗里·菲佛, 杰勒尔德·R. 萨兰基克. 组织的外部控制: 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M]. 闫蕊,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6:3-6.
- [20]朱红根, 解春艳. 农民工返乡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2(4):36-46.
- [21]刘畅, 齐斯源, 王博. 创业环境对农村微型企业创业绩效引致路径的实证分析——基于东北地区实地调研数据[J]. 农业经济问题, 2015, 36(5):104-109, 112.
- [22]陈德仙, 黄中伟. 制度环境三维度及其交互作用对家庭农场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8, 39(5):780-788.
- [23]陈德仙, 黄中伟. 制度环境对家庭农场的影响研究: 一个文献综述[J]. 经济体制改革, 2019, (5):81-88.
- [24]黄胜, 周劲波. 制度环境对国际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J]. 科研管理, 2013, 34(11):87-94.
- [25]肖卫东, 杜志雄. 家庭农场发展的荷兰样本: 经营特征与制度实践[J]. 中国农村经济, 2015(2):83-96.
- [26]朱启臻, 胡鹏辉, 许汉泽. 论家庭农场: 优势、条件与规模[J]. 农业经济问题, 2014, 35(7):11-17, 110.
- [27]陈楠, 郝庆升. 家庭农场发展环境要素分析与实证验证——基于吉林延边的调查数据[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7, 38(3):429-436.
- [28]朱红根, 刘磊, 康兰媛. 创业环境对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15(1):15-25.
- [29]任重, 薛兴利. 家庭农场发展效率综合评价实证分析——基于山东省 541 个家庭农场数据[J]. 农业技术经济, 2018(3):56-65.
- [30]李星星, 曾福生. 家庭农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以湖南为例[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8(6):79-85.
- [31]高杨, 李佩, 陆姣. 基于发展新理念的粮食类家庭农场成长绩效测评研究[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2):63-71.
- [32]胡宜挺, 叶红敏. 家庭农场扶持政策需求优先序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新疆的调查[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6, 37(4):733-739.